

大禹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研究

A Study of the Circulation and Effects of DaYu Culture in Japan

胡春艷 李 珊

HU Chunyan LI Shan

要旨：大禹は中国古代神話や伝説上の著名な治水英雄であり、中国の夏王朝を開き、治水神として信仰されてきた。大禹文化は中国伝統文化の重要な一部であり、本論文は中日文化交流史の視点から、大禹文化を対象に、中日文献の整理、分析と遺跡の实地調査を通して、中国の大禹文化が日本における研究と文化流布の役割を明らかにし、文化交流と影響を探究する。

キーワード：大禹文化；遺跡；流布；影響

目 录

- 1 问题提出
- 2 先行研究
 - 2.1 大禹文化在中国的研究
 - 2.2 大禹文化在日本的研究
 - 2.3 大禹文化在日本传播与影响研究
- 3 中日大禹遗址介绍
 - 3.1 日本大禹遗迹介绍
 - 3.2 中国大禹遗迹介绍
- 4 中日大禹文献整理分析
 - 4.1 “禹”字在中国文献的使用情况
 - 4.1.1 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出典
 - 4.1.2 隋唐五代十国宋时期的出典
 - 4.1.3 元明清时期的出典
 - 4.2 “禹”字在日本文献的使用情况
 - 4.2.1 “禹”字在日本王朝时代的使用情况
 - 4.2.2 “禹”字在日本五山时代的使用情况
 - 4.2.3 “禹”字在日本江戸時代的使用情况
 - 4.2.4 “禹”字在日本明治時代的使用情况

4.3 中日文献使用情况对比

4.3.1 整体使用情况比较

4.3.2 历时使用情况变化的比较

5 大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6 结语

1 问题提出

大禹建立了夏王朝,开创了中国最初的中央集权国家。治理了黄河的水患,是一位治水有功、造福人民的圣人帝王。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和人类文明的开拓者,其治水伟业和英雄故事家喻户晓。其所蕴含的大禹文化内涵和外延是非常丰富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论文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视域下,以大禹文化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搜集整理分析与实地考察为前提与基本途径,以安徽省禹会村遗址的考古成果为重心,阐释大禹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具体研究意义和价值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促进安徽省考古成果的域外传播与影响。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村作为“禹会诸侯”“娶于涂山”的遗址,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涂山一带是古代典籍记载大禹活动的重要地区。本论文旨在激发域外大禹研究者对安徽省蚌埠市禹会村的寻源,从而促进安徽省考古成果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

(2) 促进中日大禹文化交流和相关古籍的对日传播。

以禹会村的考古成果和大禹文化为契机和纽带,诠释大禹文化在日本的文化内涵,增强其在日本的影响,促进中日两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促使大禹文化相关中华古籍的外译,让日本学者更深入地了解大禹文化内涵。

2 先行研究

2.1 大禹文化在中国的研究

大禹文化有两个层面的涵义,其一是大禹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王朝的奠基人或开创者,在他的历史事迹基础上形成的夏禹文化。其二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大禹记忆的传承过程,是一种掺杂融合了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人们的价值取向的文化再创造。(杨玉洁 张娜,2023)大禹文化在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 考古学和历史学对大禹真伪的研究。

1923年由顾颉刚古史辨运动引发了疑古派与信古派关于大禹信使的旷久之争。疑古派的代表主要有胡适、钱玄同、钱穆、傅斯年、周予同、王伯祥等,信古派的代表主要有胡堇人、柳诒征、李玄伯、王国维等。(朱鹏,2022)而安徽省蚌埠市禹会村遗址的发掘从考古学上确定了禹会村遗址即禹会诸侯之地,与《左传》中的“禹合诸侯于涂山”不谋而合,证实了大禹的真实存在,为大禹成为信史提供了考古学上强有力的证据。

(2) 神话学对大禹神话的阐释椰梅

丁山（2017）（2011）从神话学的角度对夏朝以及大禹治水的神话进行了研究。闻一多（2014）孙作云（2003）王宇信（1989）刘付靖（2007）利用图腾学对大禹的神话形象是“龙”还是“蛇”亦或是“鱼类或爬行类动物图腾”进行了阐释。另外，神话中还有大禹化熊（叶舒宪，2008）和大禹娶涂山女的传说（尹荣方，2017）。总之，大禹作为神话学的重要人物，内容丰富，观点多样，众多纷纭。

（3）民俗学对大禹文化内涵的诠释

诸多学者主要是通过田野调查方式对四川、浙江、河南等地的禹庙、禹祭进行考察，诠释了当地的大禹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主要有龙显昭（1999）、衣晓龙 陈勤建（2008）、张彦苏东来（2016）对四川禹庙和羌族大禹文化的调查研究。杨曼（2011）以浙江绍兴的禹祭文化为例，介绍了大禹文化在当地的发展。朱鹏（2022）以河南登封大禹传说为中心，对地方传说文化的传承实践研究进行了建构。

2.2 大禹文化在日本的研究

大禹文化在日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大禹遗迹考证和大禹的相关研究。

（1）日本大禹遗迹的考证

在日本对大禹遗迹进行考证研究工作的主要是“治水神·禹王”研究会。该学会历经了10余年，对日本全国各地的大禹遗迹进行了现场考证和背景研究。截止到2022年11月末被认定为禹王遗迹的有165处。通过研究会的实地考察、田野调查和文献整理，采用文字和图片两种形式对每一处遗迹的建造年代、地点、形态、目的以及设置者都进行了详尽的说明。（植村善博 関口康弘 大邑潤三 治水神·禹王研究会，2023）

此外，还对日本大禹遗迹存在的原因、存在的形式进行了分析。日本的大河流域常受水害侵袭，这些地方对治水神有着根深蒂固的信仰，往往会设有禹王庙、禹王像、禹王碑等，现在这些地区很多还在开展禹王的祭祀活动。

（2）日本与大禹相关的研究

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記』（712年）中记载有“名高文命”字样，在『日本書紀』（720年）中出现了“禹王”，空海在『三教指帰』（797年）中则记有“禹筆何書”。据史书记载早在8世纪，大禹就被日本人所熟知。同时引用了《史记》《论语》中的大禹记载，介绍了中国的夏文明、大禹传说。并指出近年来中国对“弘扬大禹精神”“传承大禹文化”的普及，认为中国浙江省绍兴市对大禹的表彰和研究最为活跃。（植村善博 関口康弘 大邑潤三 治水神·禹王研究会，2023）。

王敏（2014）指出：大禹是两国“文化资料库”中相通的存在，是汉学文化圈的连接点。同时探索了大禹在日本被膜拜的原因、大禹娶涂山的传说以及大禹在现代日本社会中情况等诸多方面。

吉原浩人（2022）对日本从奈良到平安时代的汉学古籍进行了整理，例举了大禹出典的各种形式，探究了日本古代文人在汉学典籍中创造的大禹形象。

另外，还有关于大禹谟碑文真伪的讨论。代表学者是中岛敏夫，从2005年到2007年先后写了4篇题为『《尚書》〈大禹謨〉「人心」十六字偽作説について』的系列论文。

由此可见，日本汉学家对于大禹的研究内容丰富，视角多样。特别是对日本大禹遗迹的考证研究非常详实。

2.3 大禹文化在日本传播与影响研究

大禹文化在日本源远流长，但是对于大禹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研究还没有形成体系。主要有梁继国 张爱萍（1998）将“大禹治水”与日本的“土母治水”从治水神和治水方法两方面进行比较，得出了日本“土母治水”受“大禹治水”的影响颇深的结论。张爱萍（2005）进一步将中国的“禹祭”和日本的“泥祭”进行比较，认为“泥祭”脱胎于“禹祭”，“土母治水”源于“大禹治水”。

另外，日本举办了许多大禹相关的展览会来加强大禹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从2010年起至今，日本文化财团每年在日本大禹遗迹的所在地都举行“禹王峰会”的信息交流会，参加人数都在几百人乃至上千人。“治水神·禹王”研究会自2013年起至今，每年都举办全国性的治水神·禹王研究大会，发表最新的学术成果。同时，为了提高大禹在日本社会的认可度，“治水神·禹王”研究会与立命馆大学历史都市防灾研究所在2018年举办了题为「災害文化遺産 日本の禹王遺跡と治水神・禹王信仰展」的展览会，并被日本三大报的读卖新闻报道。

由此可见，大禹作为治水神的信仰在日本的流传度很高，在有水害困扰的地方都有大禹的遗迹，相关学者也为其在日本的传播进行了一系列的推广活动。

3 中日大禹遗迹介绍

3.1 日本大禹遗迹介绍

根据日本治水神·禹王研究会遗迹认定委员会的认证结果，截止到2022年1月末为止，日本全国共有禹王遗迹165件。分布地区北至北海道南到冲绳，遍布日本全国各地。遗迹的形式也丰富多样，包括了禹王的木像、庙宇或祠堂、刻有“禹”“文命”等字样的石碑或铭板、建筑物、绘画等等。在日本治水神·禹王研究会考证的遗迹中，石碑和铭板多达70%。这些遗迹修建在寺庙、神社和墓地的占了40%，修建在堤坝和河岸的占了30%。从其设置的目来看，为了表彰对地区有所贡献之人，将他们比作大禹的占了60%，表现治水信仰的占了16%。

（植村善博 関口康弘 大邑潤三 治水神·禹王研究会，2023）

从上述占比最多的碑刻、铭文上所记载文字来看，大多都是为了纪念表彰在治水方面有突出贡献之人，将他们以大禹为喻，表彰其丰功伟绩。如：A-2 川村孫兵衛紀功碑，是为纪念川村孙兵卫所建，表彰其在仙台北部的治水、水利工程所作出的贡献，纪念碑的碑文中则有“故能治水者抑其害而收其利鳥神禹以下皆然”“神禹以後唯有公”的記述，治水之大成者非大禹莫属，赞扬川村是大禹之后唯一能与大禹媲美之人。

值得关注的是，有许多碑文直接引用了中国古籍，如：A-7 梅津政景彰德碑，直接引用了《孟子·离娄章句下》中“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的出典，来表彰梅津政景在岩堰用水和比井野开发方面的突出贡献。其次，《钟繇千字文》中的“九州禹跡”“禹通九郡”在碑文中累计出现了5次。同时还有一些日本文人、学者自己创作的汉诗，如“維昔夏后 平此水土 和田氏功 追蹤神禹”。（C-6 和田光重之碑）另外，出自《尚书》的“大禹謨”三个

字在 165 处遗迹中出现了 7 次。除了大禹、禹王等字眼外，还有许多以大禹的名“文命”所命名的学校、桥梁、隧道、碑文、庙宇等。

大禹在日本是作为治水神存在的，日本的大禹遗迹常常出现在水患频发的河岸、堤坝附近，其在治水方面的杰出贡献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无可替代的，所以才将在治水、灾害治理方面有杰出贡献之人与大禹相比，给予高度的表彰和赞扬。日本不仅继承了大禹治水的典故，还常常引用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大禹”出典，并自创了许多汉诗。可见大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颇深。

3.2 中国大禹遗迹介绍

邱志荣 张卫东(2024)在《中国禹迹图导读》中收录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清代的禹迹 651 处，包括禹王庙、禹王宫、大禹陵、岫嵎碑、大禹治水图、禹会村遗址等。其中安徽省蚌埠市禹会村遗址以及郑州市王城岗及阳城遗址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同时还指出中国的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重点的大禹文化核心圈，其中：四川多为大禹出生地的文化和传承记载；安徽多为大禹娶妻、会盟等文化记载；陕西、山西、甘肃、宁夏、青海、山东、江苏、河北、湖南、湖北等地多为大禹治水起源、经历与祭祀文化记载；河南多为大禹建都等记载；浙江绍兴则多为大禹治水毕功、归葬、祭祀等文化记载。下面主要就安徽省蚌埠市禹会村遗址进行介绍。

安徽省蚌埠市的禹会村遗址是上述遗址中最早的遗址之一，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虽然是龙山文化。却有中原地区河南龙山文化、黄河下游山东龙山文化、江汉平原和长江流域的同期文化特征。(王吉怀 a, 2024) 作为 2000 年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淮河中游地区选定的唯一符合课题要求的遗址，填补了区域性考古的空白。该遗址位于淮河中游的蚌埠市西郊，北纬 30° 53′ 07.5″，东经 117° 11′ 50.6″。北距涂山 4 公里，东临天河 2 公里，西部紧邻淮河，呈南北狭长形分布于淮河东岸，总面积至少有 50 万平方米。禹会村遗址正好位于淮河的中国南北分界线上。禹会村作为淮河流域一处大型的龙山文化遗址，不仅仅是一处单纯的居住型遗址，还是一处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基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2014)

禹会诸侯于涂山，禹会村遗址的考古成果对于考证涂山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夏王朝成立的重要资料。关于禹会诸侯的传说，最早见于《左传》、《国语》中的记述。

《左传·哀公七年》和《汉书》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尚书·益稷篇》载禹娶之事云：“娶于涂山。”《太康地志》载：“涂山，古当涂国，夏禹所娶也，山西南又有禹会村，盖禹会诸侯之地。”《国语·鲁语下》：“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

《汉书·地理志·当涂》：“禹所娶涂山侯国也，有禹墟。”(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2014)由此可见，“禹会”的传说由来已久，在中国文献中有着诸多记载。

而禹会村遗址出土的陶鬶盃等祭祀陶器、祭祀礼仪等都与“禹会诸侯于涂山”的文献记载高度吻合，为“禹会涂山”提供了考古学的佐证，从而证实淮河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之一，进而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在江淮地区的起源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4 中日大禹文献整理分析

本节利用大地语料库（www.大地.net），以“禹”为关键词，检索了其中日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4.1 “禹”字在中国文献的使用情况

按照“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的历时角度进行考察，“禹”字在中国文献中共出现 689 次。这些用例分别出现在 170 个作品的 283 卷中。

4.1.1 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出典

根据大地语料库的检索结果，在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禹”字出现在以下古典文献中。如：《尚书》、《诗经》、《国语》、《论语》、《墨子》、《孙臆兵法》、《孟子》、《庄子》、《楚辞》、《吕氏春秋》、《韩非子》、《荀子》、《六韬》、《周髀算经》、《新语》、《淮南子》、《盐铁论》、《说苑》、《战国策》、《列女传》等。具体存在情况如下表所示。

出典文献	次数	出典文献	次数	出典文献	次数
《尚书》	39 次	《诗经》	7 次	《伤寒论》	6 次
《国语》	3 次	《论语》	5 次	《孔子家语》	1 次
《墨子》	7 次	《孙臆兵法》	2 次	《竹谱》	5 次
《孟子》	1 次	《庄子》	3 次	《风俗通义》	1 次
《楚辞》	9 次	《吕氏春秋》	4 次	《陆士龙文集》	1 次
《韩非子》	2 次	《荀子》	17 次	《陶渊明集》	5 次
《六韬》	1 次	《尔雅》	1 次	《世说新语》	2 次
《周髀算经》	1 次	《新语》	4 次	《文心雕龙》	4 次
《淮南子》	4 次	《史记》	2 次	《高僧传》	2 次
《盐铁论》	20 次	《说苑》	8 次	《千字文》	1 次
《山海经》	2 次	《列女传》	6 次	《水经注》	13 次
《战国策》	3 次	《易林》	4 次	《文选》	25 次
《白虎通》	2 次	《论衡》	6 次	《古今刀劔录》	1 次
《汉书》	4 次	《潜夫论》	2 次	《魏书》	1 次

表 1 “禹”字在“前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出典情况一览表

由上表可知，出典前五位的文献分别是《尚书》（39 次）、《文选》（25 次）、《盐铁论》（20 次）、《荀子》（17 次）《水经注》（13 次），“禹”字在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共出现了 237 次。

在《尚书》中出现的次数最多，高达 39 次。出典分布在《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禹贡》、《五子之歌》、《仲虺之诰》、《洪范》、《立政》、《吕刑》章节。其中，《大禹

谟》中出现了 15 次，记载了大禹、伯益、皋陶和舜帝讨论治理国家以及大禹受舜禅让、开拓疆土的丰功伟绩。大禹早就提出了“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的治国观点，强调好的政治就是要“德政”，六府(水、火、金、木、土、谷)和三事(正德、利用、厚生)要有条不紊，才能被百姓歌颂。从而可以看出，大禹很有治国的谋略、深知百姓安居乐业是治国的根本。《禹贡》则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当时的疆土和水系以及大禹治水的路线和方法，“导水”部分则是开了中国水系的先河。张思纯（2018：56）指出《禹贡》不仅是中国最古老、最系统的地理文献，对中国后世地理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1.2 隋唐五代十国宋时期的出典

据大地语料库的统计结果可知，“禹”字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出现了 219 次，如：《颜氏家训》、《群书治要》、《贞观政要》、《骆宾王文集》、《王摩诘文集》、《李太白文集》、《白氏文集》、《方輿勝覽》等。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出典文献	次数	出典文献	次数	出典文献	次数
《颜氏家训》	3 次	《薛司隸集》	3 次	《隋煬帝集》	1 次
《群書治要》	11 次	《北齊書》	1 次	《陳書》	1 次
《隋書》	6 次	《晉書》	1 次	《唐律》	1 次
《千金方》	1 次	《北史》	1 次	《千金翼方》	1 次
《駱賓王文集》	3 次	《幽憂子集》	1 次	《楊盈川集》	1 次
《李嶠百廿詠》	1 次	《遊仙窟》	1 次	《孟浩然詩集》	6 次
《蒙求》	1 次	《貞觀政要》	3 次	《王摩詰文集》	5 次
《李太白文集》	5 次	《岑嘉州詩》	1 次	《杜工部集》	1 次
《韋蘇州集》	1 次	《煎茶水記》	1 次	《河東先生集》	5 次
《韓文公文集》	4 次	《白氏文集》	18 次	《李義山集》	3 次
《酉陽雜俎》	2 次	《唐英歌詩》	1 次	《唐寫本唐人選唐詩》	1 次
《浣花集》	1 次	《禪月集》	1 次	《廣成集》	6 次
《舊唐書》	1 次	《化書》	1 次	《太平寰宇記》	4 次
《筍譜》	3 次	《河東先生集》	3 次	《小畜集》	1 次
《酒譜》	3 次	《范文正公集》	4 次	《樂章集》	1 次
《新唐書》	2 次	《嘉祐集》	2 次	《廬山記》	6 次
《鐔津文集》	1 次	《洛陽牡丹記》	1 次	《元豐類稿》	1 次
《揚州芍藥譜》	1 次	《資治通鑑》	1 次	《夢溪筆談》	7 次
《唐鑑》	20 次	《淮海集》	3 次	《東坡集》	1 次

《東坡樂府》	1 次	《河南程氏文集》	5 次	《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	2 次
《輿地廣記》	12 次	《碧巖錄》	2 次	《近思錄》	1 次
《晦菴先生朱文公語錄》	5 次	《稼軒長短句》	2 次	《渭南文集》	2 次
《賓退錄》	3 次	《方輿勝覽》	10 次	《遺山先生文集》	3 次

表 2 “禹”字在“隋唐五代十国宋”的出典情况一览表

由上表可知，“禹”字在“隋唐五代十国宋”时期分布在 69 个作品，共出现了 219 次，除个别表示的是“刘禹锡”（8 次）之外，其余表示的人物都是大禹，出典前五位的文献分别是《唐鑑》（20 次）、《白氏文集》（18 次）、《輿地廣記》（12 次）、《群書治要》（11 次）《方輿勝覽》（10 次）。

其中，《群書治要》是唐朝魏征等人奉唐太宗之命编撰的“上始五帝，下至晋代”的古籍汇编，涵括了《尚書》、《論語》、《史記》、《漢書》等古籍，所以，屡次出现“禹”字不足为奇。

4.1.3 元明清时期的出典

据大地语料库的统计结果可知，“禹”字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出现了 233 次，如：《十八史略》、《農書》、《商文毅公集》、《帝鑑圖說》、《唐宋八家文讀本》等，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出典文献	次数	出典文献	次数	出典文献	次数
《文章軌範》	1 次	《十八史略》	37 次	《農書》	10 次
《江湖風月集》	2 次	《石田先生文集》	3 次	《道園學古錄》	1 次
《元曲選》	1 次	《姑蘇雜詠》	5 次	《剪燈新話》	2 次
《眉菴集》	2 次	《琵琶記》	1 次	《澹游集》	2 次
《御製文集》	1 次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	1 次	《遜志齋集》	4 次
《剪燈餘話》	4 次	《東里文集》	4 次	《于忠肅公集》	1 次
《商文毅公集》	10 次	《大學衍義補》	9 次	《懷麓堂文後稿》	3 次
《唐伯虎集》	3 次	《傳習錄》	6 次	《食品集》	1 次
《唐詩選》	1 次	《震川先生集》	1 次	《帝鑑圖說》	28 次
《本草綱目》	3 次	《李氏焚書》	1 次	《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	1 次
《牡丹亭》	1 次	《袁中郎全集》	5 次	《隱秀軒集》	1 次
《髹飾錄》	1 次	《天工開物》	7 次	《牧齋有學集》	2 次
《日知錄》	1 次	《梅村集》	2 次	《亭林詩文集》	1 次
《迦陵詞全集》	1 次	《南雷文案》	9 次	《屈翁山詩集》	1 次

《唐宋八家文讀》	20 次	《儒林外史》	1 次	《望溪先生文集》	1 次
《紅樓夢》	1 次	《板橋集》	2 次	《沈歸愚詩文全集》	4 次
《海峯文集》	2 次	《隨園詩話》	4 次	《述學》	2 次
《小倉山房詩集》	1 次	《閱微草堂筆記》	1 次	《御製詩》	1 次
《茗柯文編》	2 次	《惜抱軒全集》	3 次	《定盦文集》	2 次
《聖武記》	2 次	《古微堂詩集》	1 次	《曾文正公奏議》	2 次

表 3 “禹”字在“元明清”時期的出典情况一览表

在元明清时期，“禹”字出现在 60 个作品，共 233 次，出典前五位的文献分别是《十八史略》（37 次）、《帝鑑圖說》（28 次）、《唐宋八家文讀本》（20 次）、《農書》（10 次）《商文毅公集》（10 次）。

4.2 “禹”字在日本文献的使用情况

“禹”字在日本文献中共出现了 280 例，按照历时研究的角度分别从“王朝时代”、“五山时代”“江户时代”“明治时代”进行了考察。这些用例出现在 84 个作品的 122 卷中。

4.2.1 “禹”字在日本王朝时代的使用情况

大地语料库收集了从 5 世纪到 1900 年的日本汉籍文献，内容包括汉诗、史书、地志等。“禹”字在日本王朝时代的文献中出现在 25 个作品，共 100 次，如：『日本書紀』、『本草和名』、『經国集』、『本朝文粹』等，其中在『本草和名』中“禹”大多是指“禹餘糧”这种药材，或者指“崔禹”其人，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出典文献	次数	出典文献	次数	出典文献	次数
『日本書紀』	3 次	『正倉院文書』	2 次	『願文』	1 次
『鰐磬指歸』	1 次	『凌雲集』	1 次	『新撰姓氏錄』	2 次
『文華秀麗集』	1 次	『經国集』	4 次	『遍照發揮性靈集』	1 次
『日本文德天皇実録』	1 次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	2 次	『日本三代実録』	1 次
『本草和名』	24 次	『医心方』	2 次	『往生要集』	1 次
『弘決外典抄』	4 次	『本朝麗藻』	1 次	『江吏部集』	7 次
『和漢朗詠集』	3 次	『本朝文粹』	8 次	『参天台五台山記』	7 次
『医略抄』	5 次	『本朝続文粹』	7 次	『和漢朗詠集私注』	4 次
『長生療養方』	7 次				

表 4 “禹”字在日本王朝时代的出典情况一览表

在日本文献中出典前五位的文献分别是『本草和名』（24 次）、『本朝文粹』（8 次）、『本朝続文粹』（7 次）、『参天台五台山記』（7 次）、『長生療養方』（7 次）。在日本王朝时代“禹”

字多出现在医书中，如『本草和名』、『医略抄』、『長生療養方』中，这里面的“禹”大多指崔禹锡或者“禹餘糧”这种药材。崔禹锡也简称为“崔禹”或者“禹锡”，因其著有《食经》，在日本影响颇深，上述的医书都是引用或借鉴了崔禹锡的《食经》的观点。如：

千金方云竹笋不可共鯽魚食之成瘕病 崔禹錫食经云 茂菜不可共菟穴食成邪惡病 (1184_長生療養方_卷第一)¹

4.2.2 “禹”字在日本五山时代的使用情况

“禹”字在日本五山时代（1185-1603）出现在 20 个作品，共 111 次，如：『岷峨集』、『濟北集』、『旱霖集』、『東海一漚集』、『延寿類要』等。具体存在情况如下表所示：

出典文献	次数	出典文献	次数	出典文献	次数
『道元和尚廣錄』	1 次	『吾妻鏡』	1 次	『山国師語錄』	1 次
『岷峨集』	2 次	『東帰集』	2 次	『濟北集』	17 次
『夢窓国師語錄』	1 次	『鉄舟和尚閑浮集』	1 次	『永源寂室錄』	1 次
『旱霖集』	3 次	『東海一漚集』	3 次	『空華集』	9 次
『心田詩藁』	2 次	『猿吟集』	3 次	『下學集』	2 次
『延寿類要』	31 次	『善隣国宝記』	1 次	『京華集』	1 次
『翰林葫蘆集』	23 次	『枯木稿』	6 次		

表 5 “禹”字在日本五山时代的出典情况一览表

“禹”字在五山时代出现次数前五位的文献是『延寿類要』（31 次）、『翰林葫蘆集』（23 次）、『濟北集』（17 次）、『空華集』（9 次）、『枯木稿』（6 次）。其中『延寿類要』（竹田照慶著）中出现的次数最多，根据国立公文书馆的藏书介绍，是一本室町时代的养生书，主要介绍食物的养生、延年益寿、营养摄取的功效，作者历经三十多年中国汉方的学习，最终在康正 2 年(1456)完成。其中的“禹”字也大多是指“崔禹锡”，如：

沙糖 寒无毒 禹錫云按孟詵云 沙糖多食令人心痛不与鯽魚同食(1456_延寿類要_上冊)

4.2.3 “禹”字在日本江戸時代的使用情况

“禹”字在日本江戸时代（1603-1868）出现在 36 个作品，共 65 次，如：『周南先生文集』、『本朝列女傳』、『活所遺藁』等。具体存在情况如下表所示：

出典文献	次数	出典文献	次数	出典文献	次数
『惺窩先生文集』	4 次	『藤樹先生遺稿』	1 次	『活所遺藁』	5 次
『本朝列女傳』	2 次	『尺五先生全集』	3 次	『武教小学』	1 次
『聖教要錄』	1 次	『梅洞林先生全集』	2 次	『垂加文集』	1 次

¹ www.大地.net。如无特别注明例句均来自大地语料库。

『古学先生文集』	8 次	『語孟字義』	2 次	『弁道』	1 次
『日東魚譜』	3 次	『東野遺稿』	1 次	『猗蘭台集』	1 次
『徂徠集』	1 次	『江陵集』	1 次	『蛻巖集』	2 次
『春台先生紫芝園稿』	1 次	『湘雲瓊語』	1 次	『周南先生文集』	3 次
『芝荷園文集』	1 次	『来青軒詩稿』	1 次	『芝山稿』	1 次
『六如菴詩鈔』	1 次	『栲亭初稿』	3 次	『常山遺稿』	1 次
『蘭室先生詩文集』	2 次	『文章緒論』	2 次	『履軒鬚言』	2 次
『臥牛集』	1 次	『言志錄』	1 次	『春草堂詩鈔』	1 次
『星巖集』	1 次	『遠思樓詩鈔』	1 次	『寧靜閣集』	1 次

表 6 “禹”字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出典情况一览表

“禹”字在江户时代的文献中常常出现在诗抄里，而且分布较平均。出典前三位的是：『古学先生文集』（8 次）、『活所遺藁』（5 次）、『惺窩先生文集』（4 次），其余的都是出现 3 次以下的。其中『古学先生文集』是由江户时代京都古学派创始人伊藤仁斋所著，由其长子伊藤东涯整理，伊藤父子在日本儒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李庆（2010：4）指出“日本古学派的出现，从思想的逻辑发展角度来看，和中国清代继朱子学、阳明学之后出现考证学相类似。”在『古学先生文集』中，“禹”字都出现在其第二卷【論類】，如：

各授其政。舜之攝政也。乃命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1705_古学先生文集_文集卷之二）

讲述了大禹治水以及作为夏朝帝王与尧舜并立的丰功伟绩。

4.2.4 “禹”字在日本明治時代的使用情况

“禹”字在日本明治时代（1868-1900）只在 3 个作品中出现了 4 次，日本不同朝代的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将作为今后的课题进一步进行探讨。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出典文献	次数	出典文献	次数	出典文献	次数
『息軒遺稿』	1 次	『柳北詩鈔』	1 次	『浩蕩詩程』	2 次

表 7 “禹”字在日本明治时代的出典情况一览表

值得关注的是在明治时代，对“禹”字提及的文献巨减，只出现在少有的几本诗集中。如：森槐南的『浩蕩詩程』中有诗：

茫茫禹蹟今猶夢 明日回頭恐作虛
山海關前誰立馬 盧溝橋下且乘車 （1899_浩蕩詩程_全一卷）

4.3 中日文献使用情况对比

4.3.1 整体使用情况比较

根据大地语料库的调查结果，对“禹”字在中日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比较，为了直

观，将数值换算成了每百万字的使用次数，具体如表 8 所示：

	中国側	日本側
出現卷数	283	122
卷数総数	1005	700
卷数出現率(%)	28.1592039800995	17.42857142857143
出現作品数	170	84
作品の総数	406	358
作品出現率(%)	41.87192118226601	23.463687150837988
出現用例数	689	280
文字の総数	5861120	5212071
用例出現率(%)	0.011755432408822888	0.0053721447769993925
百万字出現率(PMC)	117.55432408822888	53.72144776999392

表 8 中日文献中“禹”字的使用情况比较

从西周到 1900 年间的中国文献中共出现“禹”字的用例有 689 例，从 5 世纪到 1900 年间的日本文献中共出现“禹”字的用例有 280 例。这些例子出现在中国文献的 170 个作品，共 283 卷，出现在日本文献的 84 个作品，共 122 卷。每百万字的使用频率中国文献为 117.55，日本文献为 53.72。

4.3.2 历时使用情况变化的比较

根据每个世纪中的使用情况，制作了中日文献中“禹”字用例的年代推移图，横轴为各个世纪，纵轴为使用次数。具体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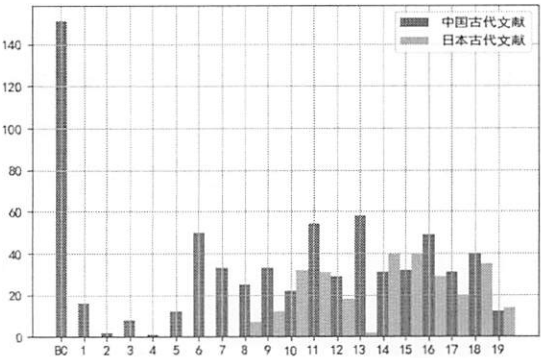


图 1：中国与日本文献中“禹”字用例数时代推移图

“禹”字在日本始于『日本書紀』，在 13 世纪的时候出现低谷，在 14 世纪和 15 世纪激增甚至超过了中国文献。究其原因主要与这一时期出现的『空華集』『濟北集』『延寿類要』

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如 4.2.1 和 4.2.2 所述，像『延寿類要』这类药书中的“禹”大多是指著有《食经》的崔禹锡，而不是指大禹本人。而在中国文献中公元前出现的次数最多，主要是因为此时期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都是这一时期的文献作品。

5 大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的大禹文化很早就传入日本，『古事記』『日本書紀』中就已经有记载，但是之前的日本鲜有文献记载，实际传入的时间有可能更早，从日本的汉籍文献中“禹”字的出现情况来看，大禹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颇深。

（1）遗迹中大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从中日各地的大禹遗迹来看，中国的大禹遗迹起源于新石器晚期，有许多考古学的佐证。其中寺庙占了 39%，山川名占了 33%。在中国主要是对大禹治水以及作为三皇五帝丰功伟绩的祭祀与信仰，这从中国禹迹中的寺庙众多可窥见一斑。而在日本的大禹遗迹中有 71%是石碑和铭板。（植村善博，2024）中日大禹遗迹的共同特点之一是很多都出现在水系附近，中国的黄河、长江、淮河以及鸭绿江等流域都有分布，日本主要分布在关东的利根川和酒匂川、中部的揖斐川、近畿的淀川等地。由此可见，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大禹都是由于治水的杰出贡献而被人们所敬仰，在日本人的心中大禹更是作为治水神而存在的。

日本对大禹文化的受容起源于大禹治水的贡献，而日本遗迹中 71%的碑文中，除了对大禹作为治水神的信仰之外，很多都是利用了大禹的比喻象征，将对治水和灾害治理有突出贡献的人以大禹为喻，来表彰他们的业绩。植村善博（2017）指出：日本的禹王遗迹是灾害文化遗产，在日本的存在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作为治水神对其信仰；二是作为圣人君主对其崇拜；三是借大禹来比喻在治水和勤政上有功绩之人。在日本人的心中，大禹文化的精神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那些对治水和灾害治理有突出贡献的人是对大禹平水土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2）文献中大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王吉怀（2024b）指出古籍中记载的大禹内容主要有以下 5 个方面：①尧舜禹时代的恶劣环境。②大禹治水的劳苦功高。③大禹为人的修养德行。④大禹一统华夏的治国理念。⑤历代圣贤对大禹的评价。在日本文献中主要接受的方面是大禹治水的劳苦功高和作为帝王的文韬武略。如：「禹平水土」、「禹導九州」、「禹跡九州」，或者是将「尧舜禹汤」一起称之为“四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文献中，「禹門」「禹步」「禹餘糧」等出现的频率也很高。

「禹步」传说为大禹所创，后发展为道教的罡步。日本的茨城县大杉神社的石板上就设有禹步图供参拜者体验。「禹門」在中国对应的是“龙门”，来源于“鲤鱼跃龙门”的典故。在日本称之为「禹門」，可见大禹在日本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而「禹餘糧」作为一味中药，也与大禹传说有关，在日本的医书文献中大量出现。

由此可见，日本文献对大禹文化的接受主要还是大禹治水与治国的功绩，对大禹本身的修养德行方面鲜有提及，其不畏辛苦，三过家门而不入，礼让、勇敢等文化内涵还有待进一步的宣传与传播。

6 结语

本论文以大禹文化为研究对象，比较了中日大禹遗迹和“禹”字在中日文献中的存在情况，并对大禹文化在日本的影响进行了简单的探索。总结如下：

(1) 中国有大禹遗迹 651 处，日本有大禹遗迹 165 处。中国大禹遗迹主要集中在寺庙与山川地名，而日本大禹遗迹主要集中在石碑。日本接受了大禹治水的典故，将大禹作为治水神来信仰，并用来表彰对治水 and 灾害治理有突出贡献的人。

(2) 日本从『古事記』『日本書紀』开始就出现“禹”字，在 14、15 世纪甚至超过了中国文献，而在中国文献中公元前是“禹”字出现的高峰期，这与中国公元前诸子百家争鸣，四书五经经典文献层出不穷有很大关系。日本在不同朝代中“禹”字分布不均的原因将作为今后的课题进一步进行探讨。

(3) 无论是在文献还是在遗迹方面，中国的大禹文化都对日本有着深刻的影响，大禹治水平土的典故在日本流传广泛，同时日本还自己有所创新，比如将中国的“龙门”称之为禹门。但是对于大禹自身的修养品德、大禹文化的深层解读还存在着不足，今后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应积极探索大禹文化在日本的影响与传播路径，进一步扩大大禹文化在日本的影响与受容。

参考文献

日语文献

植村善博 (2017) 「災害文化遺産としての禹王遺跡と京都の治水神・禹王信仰」, 『歴史都市防災論文集』 (11), pp.231-236.

植村善博 治水神・禹王研究会 (2019) 『禹王と治水の地域史』 古今書院.

植村善博 関口康弘 大邑潤三 治水神・禹王研究会 (2023) 『日本禹王事典』 古今書院

植村善博 (2024) 「『中国禹跡図 2022 年版』の意義とその検討」, 『佛教大学 歴史学論集』第 14 号, pp.23-39.

王 敏 (2014) 『禹王と日本人—「治水神」がつなぐ東アジア』 NHK ブックス

中島敏夫 (2005) 「《尚書》〈大禹謨〉『人心』十六字偽作説について(1)」, 文明 21 (15), pp. 163-182.

——— (2006) 「《尚書》〈大禹謨〉『人心』十六字偽作説について(2)」, 文明 21 (16), pp. 53-76.

——— (2006) 「《尚書》〈大禹謨〉『人心』十六字偽作説について(2)」, 文明 21 (17), pp. 215-234.

——— (2007) 「《尚書》〈大禹謨〉『人心』十六字偽作説について(4)」, 文明 21 (18), pp.1-19.

蜂屋邦夫 (2022) 『中国の水の物語 神話と歴史』 法蔵館.

吉原浩人 (2022) 「日本古代の漢文学における禹の形象 -附・湖南省大禹碑探訪記」, 多元文化 (11), pp.223-245.

梁繼国 張愛萍 (1998)「大禹治水」より「土母治水」へ—中日洪水神話に関わる比較研究」, 茨城大學人文学部紀要 (3) pp.83-104.

汉语文献

白鸟库吉 (1992)《中国古传说之研究》, 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 (第一卷通论)》, 黄约瑟译, 中华书局.

丁 山 (2017)《古代神话与民族》, 中华书局.

—— (2011)《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 上海书店出版社.

【春秋】孔丘编著 张思纯译注 (2018)《尚书诠释》, 开明出版社.

刘付靖 (2007)〈禹神话与上古南岛语系民族的鱼类和爬行类动物图腾崇拜〉,《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年 (4): pp. 65-69.

李 庆 (2010)《日本汉学史》第一部 起源和确立 (1868-1918), 上海人民出版社.

龙显昭 (1999)〈夏禹文化与四川的禹庙〉,《四川文物》1999 (1): pp. 28-34.

邱志荣 张卫东 (2024)《中国禹迹导读》,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作云 (2003)《中国古代图腾研究》,《孙作云文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 (上)》, 河南大学出版社.

王鼎、宗聪 (2024)〈日本汉字词语料库 “大地语料库” 的建设与公开〉,《日语学习与研究》2024 (02): pp. 125-127.

王吉怀 (2024a)〈从考古发现中寻找大禹〉, 邱志荣 张卫东 (2024)《中国禹迹导读》中国文史出版社.

—— (2024b)〈弘扬大禹文化 传承大禹精神〉, 2024 年 3 月 8 日在安徽科技学院学术报告.

闻一多 (2014)《伏羲考》《神话与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王宇信 (1989)〈由《史记》鲧禹的失统谈鲧禹传说的史影〉,《历史研究》1989 (6): pp. 137-144.

杨 曼 (2011)《民俗主义视角下的绍兴大禹祭祀文化》,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叶舒宪 (2008)〈大禹的熊旗解谜〉,《民族艺术》2008 (1): pp. 41-45.

尹荣方 (2017)〈“九尾狐”与“禹娶涂山女”传说蕴意考〉,《文化遗产》2017 (1): pp. 105-110.

衣晓龙 陈勤建 (2008)〈对震后北川羌族自治县禹羌文化保护开发的思考与对策〉,《西北民族研究》2008 (4): pp. 1-9.

杨玉洁 张 娜 (2023)〈大禹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中华文化论坛》2023 (2): pp. 26-34, 185.

张爱萍 (2005)《中日古代文化源流—以神话比较研究为中心》,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安徽省文化厅 蚌埠市人民政府 编著 (2014)《禹会村遗址研究》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论文集, 科学出版社.

朱 鹏 (2022)《地方传说文化的传承实践研究—以登封大禹传说与信仰为中心》, 山东大

学博士论文.

张彦 苏东来 (2016)〈清代巴蜀地区湖广移民与大禹信仰〉,《中华文化论坛》2016(11): pp. 53-60.

付記

本研究为 2024 年度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 (项目编号: 2024AH052395)「大禹文化在日本的翻译、传播与影响研究」(研究代表者: 胡春艳)、2023 年度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 (项目编号: 2023AH051832)「淮河流域明文化传播力提升研究」(研究代表者: 李珊)、2023 年度安徽科技学院明文化研究专项 (项目编号: 2023RW04)「短视频平台赋能下凤阳明文化传播提升研究」(研究代表者: 李珊)阶段性成果。

胡春艳 安徽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李珊 安徽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讲师